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四編 第十冊

文武分區： 地域性經濟特徵對東晉南朝政局之影響

權家玉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四編

王明蓀主編

第10冊

文武分區：
地域性經濟特徵對東晉南朝政局之影響

權家玉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武分區：地域性經濟特徵對東晉南朝政局之影響／權家玉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2+190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10 冊）

ISBN 978-986-404-318-7（精裝）

1. 政治經濟 2. 魏晉南北朝

618

104014374

ISBN-978-986-404-318-7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十冊

ISBN：978-986-404-318-7

文武分區：地域性經濟特徵對東晉南朝政局之影響

作 者 權家玉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173810 字

定 價 十四編 28 冊（精裝）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文武分區：
地域性經濟特徵對東晉南朝政局之影響

權家玉 著

作者簡介

權家玉：1980年生，安徽壽縣人，現為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2004～2009年於武漢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2009～2011年在中山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並先後發表論文10餘篇，主持中國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一項。研究旨趣主要集中在：西晉政治史、南朝政治史、社會史、及財政史等方面。

提 要

南朝的政局演變呈現出圍繞著地域為中心的博弈狀態，隨著政權與地方州鎮彼此實力的消長，最後形成的是生與死的較量。軍事實力固然是其中的主導，然經濟與財政的基礎卻成為彼此掌控局勢的最終決定力量。

吳會地區是南朝經濟的重心，自孫吳後期江南政權形成的吳會支持建康的經濟運行模式為東晉南朝繼承，然吳會的富足卻不能改變建康的財政困境和社會士族層的貧困。財政的匱乏導致了建康政權與社會的雙重矛盾，一方面促使建康加大了對揚州境內的賦稅徵收，這直接導致揚州境內經濟發展的不穩定，編戶赤貧狀況嚴重，乃至在外部原因的推動下，短時期內出現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況，而這又反作用於政權財政，使其保持在持續困頓的狀態。另一方面，建康社會大量以居官為生的士族，此時遇到了生活的困境，俸祿的不穩定使其生存來源難以保證，貧困在建康士族社會中呈蔓延趨勢，這直接影響到他們出仕的態度。財政的危機與社會的危機交織，推動定都於此的南朝政權逐步走向衰弱。

與北朝的對峙決定了緣江與緣淮各州鎮的存在，頻繁的軍事衝突使軍鎮財權自主成為必然，這也為其財政積累提供了便利。總體而言，軍鎮地區的經濟開發及財政狀況主要依賴都督個人政策，故其發展極不穩定且不具備連續性。正由於這種狀況使都督在軍鎮的經濟開發具備了極大的空間，他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短時間內充實府庫，地方收入在基層存在積累，為都督積聚物資力量提供了條件，使其軍事力量得以維持乃至增強，在一定時期內甚至湧現出足以與政權相抗衡的一個或多個軍鎮，乃至有取而代之的趨勢。擁軍自重的軍鎮在財權獨立的條件下，政權失去了對其穩定的掌控，南朝政局的演變趨勢告訴我們，正是財權的下放導致統御力量的喪失，使南朝政局在混亂中重複上演一幕幕外鎮入主取代建康政權的鬧劇。

軍事上的北重南輕、經濟上的東重西輕，使政治上本已揚州獨重的局勢更加複雜。建康財政來源日趨孤立與軍鎮財政的相對自主同步。經濟的地域性不平衡，建康財政依賴富足的吳會地區而匱乏，荊雍軍鎮仰仗湘贛地區而充實。建康政權衰弱後，地方性的離心直接推動軍鎮逐漸走向政權的對立面，推動著南朝政權的新舊更替。



目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東晉南朝疆域內總體經濟布局	11
第一節 東晉南朝疆域內的人口狀況	11
第二節 東晉南朝境內的倉儲分佈	17
一、南朝境內大體倉儲狀況	17
二、建康以外諸倉分佈	21
三、東晉南朝的倉庫管理	24
四、結語	30
小 結	31
第三章 揚州的經濟狀況及建康的財政困境	33
第一節 東晉南朝時期建康的財政狀況	34
一、五朝建康的財政危機	34
二、財政危機的原因	40
三、財政的匱乏與政權的衰退	44
第二節 吳會地區的經濟負擔及影響	47
一、吳會地區的賦稅負擔	48
二、沉重的經濟負擔對揚州經濟的影響	55
三、江南的「亡命」與「逋逃」	58

第三節 南朝建康的社會危機——以建康士族貧困問題爲中心	63
一、南朝建康士族生活貧困的狀況	65
二、士族生活陷入貧困的原因	69
三、俸祿的微薄對南朝吏治的影響	81
四、家族親友間的救濟	89
五、結語	92
小 結	93
第四章 軍鎮財政的自主及其半獨立狀態的確立	95
第一節 軍鎮府庫的經濟財政來源	95
一、軍府的府庫財政	96
二、都督於軍鎮財政的自主性	101
第二節 東晉南朝的邊境屯田	103
一、東晉南朝的屯田倡議	104
二、東晉南朝屯田事蹟及地理分佈	110
小 結	118
第五章 南朝文武分區局面的形成及影響	121
第一節 政權京畿化：南朝政權的建康本土化與政局演變	121
一、南朝皇族與官僚機構性質的轉變	122
二、軍事及力役基礎的轉移	133
三、政權地緣化與南朝的政治演變	138
四、結語	144
第二節 文武分區：南朝的空間結構與政治演變	144
一、東晉的歷史遺留問題	146
二、武人的境遇及其由武轉文的趨勢	151
三、建康武力的衰弱及與軍鎮的脫離	158
四、軍鎮的覺醒及對建康的衝擊	163
五、結語	170
第六章 餘 論	171
參考文獻	175
後 記	187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背景

南朝政權承接於東晉，表現出與東晉極為相似的特點，故眾多前人在關注南朝時每每從東晉論起，從而提出一個新的概念——五朝〔註1〕。東晉在建康社會層面與南朝特點相似，然政權結構出現了很大的不同，由此引起的士族與政權的結合方式也出現了變化。南朝四代特徵也不盡相同，大抵宋齊政變連連，頻繁易主，表現為約三十年左右一次州鎮入主〔註2〕。進入梁代，因梁武帝本人壽命較長突破了這一怪圈，然而政治矛盾的長期積壓，帶來的是對建康政治與社會一次摧枯拉朽的衝擊。建康城因之遭到嚴重破壞，更為突出的是對士族社會的打擊，飽受戰亂的建康士族，幸存者大部幾經遷轉抵達江陵，隨後北周對江陵的攻擊乃使建康餘音灰飛煙滅，陳朝統治下的建康城，自東晉建立起的建康社會僅剩餘響。故在研究建康社會時，多自東晉始，而至梁末終。自五朝政治的特點而言，東晉創立格局，宋齊為最具代表性的政權，梁武帝一人耗盡梁朝生命力，侯景之亂成為分水嶺，陳朝所繼承之江南政權，不論政治抑或社會，都與此前存在較大區別，故這裡仍由東晉論起，而較少涉及陳朝。

南朝四代，不論政治、經濟乃至軍事都呈現出極為突出的地域性特徵，

〔註1〕 概念始於章炳麟先生之《五朝學》、《五朝法律索引》，繼以王伊同的《五朝門第》和毛漢光〈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權之影響〉（收於《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註2〕 《南齊書》卷57〈魏虜傳〉載北魏李元凱云：「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

故在研究南朝史時，地域性特徵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從經濟地位看，揚州自成一區；湘贛、荊州之地較其他地區突出，亦可為一區；襄陽淮河一線及東部徐兗地區軍鎮經濟狀況相似，作為戰區經濟可為一區；益梁及西南廣袤區域經濟落後，或因其南朝政治經濟中處於邊緣地位，基本不在本文考量範疇。

〔註3〕這種突出的區域性經濟所支撐的上層建築，也呈現突出的地域性特徵，而這些對南朝政局的影響極為深遠，一定程度上決定其發展方向。

吳會地區是南朝經濟的重心，而財政上對這一區域的過分依賴，一方面推動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迅速改變了三國以來南方的經濟格局，吳會地區迅速超越湘贛流域，成為江南第一經濟大區。同時在有利的條件下也產生極為不利的負面效應，由於對吳會地區過分依賴，使這一區域經濟負擔極為沉重，正稅以外的雜稅、勞役徵收繁重。因稅收負擔導致大規模編戶逃亡現象，就只在吳會地區出現過。經濟實力及政策上的地域性差別，導致建康政權在經濟來源上相對孤立，財政一直捉襟見肘，士族生活來源的單一性（建康士族主要依賴俸祿維持生計），也使都城的士族群體都不同程度的面臨貧困問題。財政問題與社會問題雙重危機影響下的建康，以及以此為中心的揚州區域，政治與社會矛盾突出，而這些反作用於揚州經濟，從而導致其在一定時期內很難實現持續發展。

財政的長期不景氣對政權影響深遠，東晉立國之初直至滅亡，即表現出先天不足的特點，政權的羸弱與軍鎮的強大，使整個東晉王朝舉步維艱，荊揚之爭幾乎伴隨東晉始末。東晉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江南半壁分裂最長的時期，分裂時期的特殊狀態，決定了軍事問題的突出地位，強則努力統一，弱則維持割據，而無論哪一種狀況，在邊境設置強大軍事據點都在所難免，故東晉南朝時期在秦嶺淮河、長江分佈了兩道防線，軍鎮林立。為了便於各軍鎮武裝的維繫以及軍事活動的自主，都督多領刺史，實現軍權與民權的統一，地方的租稅收入也基本上用於都督區自身建設，由此引起的南朝揚州以外地區地方性財政收支自主，都督區獲得了賴以生存的財政權，深陷危機的建康財政每每因軍鎮財政之不足，更背上了沉重負擔，從而加劇了其財政的惡化。這一方面使建康政權失去了廣大區域的財稅收入，同時地方財稅自主

〔註3〕對於南朝境內的經濟分區，目前以許輝、蔣福亞在《六朝經濟史》中提出的分區為代表，將南朝境內分為以巴蜀、江漢、三吳為三個大區，豫章、嶺南、閩江亦粗具規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也使都督區擺脫建康統御成為可能。

相對於吳會地區賦稅徵收的穩定，緣淮、緣江諸鎮由於其軍事特點，在建康財政來源中都不具有突出地位。襄陽、緣淮諸鎮的錢糧收入，在南朝基本不過江。南朝軍事重鎮中，東北面的徐兗一帶，軍鎮支出除本鎮賦稅收入外依賴建康財政補充，西北面之雍州一帶則除本鎮租稅外尚能獲得湘贛地區財稅資助。湘贛流域的經濟水平僅次於吳會地區，東西兩面軍鎮各自實力的消長與這種經濟的背景密不可分。軍鎮在與建康對立中，東西兩面存在明顯不同：東面軍鎮成功者皆為進入建康控制政權後，借助建康財力剪除突出軍鎮，實現政權的緩慢轉移，其中自不乏舉兵者，則基本上困守孤城，很難直接出兵進攻建康；〔註4〕而西面軍鎮則多為舉兵東下，固然成功者少，而強硬的態度自與湘贛地區的經濟後盾密不可分。

與北朝的對峙，造就了南朝的軍事力量分佈及軍鎮格局〔註5〕，大量實力強大的軍鎮的存在，在東晉南朝成為必然，從而造就了北重南輕的軍事格局。南朝揚州以外各地尤其是長江淮河沿線軍鎮的地方性開發極不穩定，也為軍鎮的財政積累提供便利。「宋齊時代地方軍的養兵費（含募兵費），通常由地方稅、商稅和屯田收入供應。」〔註6〕總體而言，軍鎮地區的經濟開發及財政狀況主要依賴都督個人政策，故其發展不具備連續性。正由於這種狀況使都督在軍鎮的經濟開發上，擁有極大的自主空間，他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短時間內充實府庫，並且從有限的資料反映，在南朝吳會地區因賦稅負擔出現大量流亡時，外鎮都督區並未出現這種跡象，這一方面導致對地方經濟的開發推動不力，另一方面也可知地方收入在最基層存在積累，為都督積聚物資力量提供了前提。

軍事上的北重南輕、經濟上的東重西輕，使政治上本以揚州獨重的局面更加複雜。地方財權逐漸獨立化，建康財政來源日趨孤立與軍鎮財政的相對自主同步。經濟的地域性不平衡，建康依賴吳會地區而貧困，荊雍軍鎮仰仗

〔註4〕詳參《宋書》卷79〈文五王·竟陵王誕傳〉及卷88〈沈文秀傳〉。

〔註5〕周一良指出：「東晉南朝政權建立之形勢，據南面北，外北而內南。」〈《南齊書》札記·南朝東南內地之位置〉，載於《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年，231頁。

〔註6〕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人と社會》第4章〈宋の孝武帝とその時代〉，研文出版，1985年，206頁。同時他在〈南朝州鎮の財政について〉一文中，對此有專述。載於《東洋史學》第24輯，1961年。

湘贛地區而充實。建康政權直轄力量衰弱後，地方性的離心直接推動軍鎮逐漸走向政權的對立面，經濟的自主更爲其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東晉南朝時期，由於經濟的發展不平衡，呈現出突出的地域性特徵。這一特徵直接影響到南朝政局的發展乃至軍事力量的消長，意義主要分爲如下幾個方面：

1、從經濟地域性分佈的背景探討建康政權財政危機及建康社會士族的貧困。這對於探討以建康爲中心的南朝政治具有重要意義，並且對於全面認識士族社會提供了必要的補充。同時可以瞭解在建康受困於嚴重的財政危機時，士族社會貧困問題的蔓延，也使建康政權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由此引發的南朝因爲貧困獲得外任治民官成爲常態，外任官的腐化客觀上推動了地方對建康政權的離心。

2、從地域性經濟實力和政策的差別探討軍鎮發展的軌跡。東晉南朝徐兗地區與雍州地區軍鎮實力的此消彼長雖然不少前人對此著墨頗多，卻始終難以揭示現象背後的實質，經濟後盾的實力區別使徐兗軍鎮實力的衰落和雍州軍鎮力量的崛起成爲必然，雖然政策的傾斜可以延緩，卻無法改變這一趨勢。

3、從鎮區的財政積累探討軍鎮的崛起。東晉南朝一直上演著軍鎮進入建康取代政權的歷史，這其中建康內部的權力鬥爭和屢次政變固然起到重要作用，而從軍鎮的看，都督擁有幾乎完整的財權，無疑是軍鎮力量壯大之足以取代建康政權的重要保證。目前國內對軍鎮財政狀況研究缺乏，對軍鎮財政的探討從另一個角度展開了南朝政治演變的原因。

東晉南朝的地域性爲題，不僅僅局限於政治與軍事，經濟的地域性在其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研究現狀

目前對東晉南朝史的研究主要分佈三個區域：國內、日本和臺灣，成果相對較多，並取得了較大程度上的突破。由於涉及較廣，以下按照涉及問題的不同稍作梳理。

涉及南朝經濟史的成果相對較多，較早的如韓國磐先生的《南朝經濟史》（後與其另一力作《北朝經濟史》合而爲《南北朝經濟史》）應屬此領域的開山之作。此後高敏的《中國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經濟卷》及何德章的《中

國經濟通史》第三卷，對南朝總體經濟狀況、土地開發、賦稅及戶籍管理等諸方面都有較多研究。另外關注東晉南朝的經濟史著作還有許輝、蔣福亞主編的《六朝經濟史》，對南朝經濟區進行了劃分〔註7〕；陳明光的《六朝財政史》最早開展了對南朝財政的研究。〔註8〕但對於這種由於經濟的地域性不平衡，一方面促使建康經濟來源空間的狹窄，同時也導致軍鎮獨立性相對增強的狀況並無涉及。

鑒於地方勢力在六朝史中的作用以及南朝歷史所體現出的地域性特徵越來越受到關注，1987年中日學者遂就此一專題舉行專項研討會，會後結集《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註9〕，對南朝的地方軍府勢力入主建康問題頗多創建，谷川道雄更是指出了南朝政治改朝換代的實質，就是地方勢力一次次的在試圖取代中央的過程〔註10〕。目前日本學者中從地域性研究南朝的主要以中村圭爾為主〔註11〕，他對南朝政權中心建康地區及其附近數鎮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同時對江南社會的開發和地域性都給予較多關注，尤其是建康與三吳、會稽地區的經濟關係，進行過較為充分的研究，對以建康為中心的揚州地區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

隨著區域史研究的發展，對以建康為中心的揚州地區經濟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臺灣學者黃淑梅在《六朝太湖流域的發展》一書中，即詳細的考察了太湖地區的地理、人口、經濟發展等諸多問題。這裡是六朝經濟的重心，但是她對南朝政權對這一地區統治的情況並未過多涉及，尤其對建康與這一地區的緊密聯繫情況未能深入探討。

揚州地區作為五朝的經濟重心，目前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儘管有人曾將南朝境內劃分為各個經濟區，但三吳地區獨重的形勢卻也無法迴避〔註12〕。

〔註7〕 後蔣福亞另著《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對其此前的觀點有很大程度的推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註8〕 另外他在《六朝經濟》及《漢唐財政史論》兩部著作中都對南朝的經濟及財政做出深入探討。

〔註9〕 谷川道雄主編，日本玄文社，1989年。

〔註10〕 谷川道雄，〈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收於同名論文集。

〔註11〕 《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汲古書院，2006年。

〔註12〕 許輝、蔣福亞主編的《六朝經濟史》中指出：「六朝時期，經過南北人民的共同開發，長江流域的巴蜀、江漢、三吳在舊有的基礎上，社會經濟又有了長足的發展，進一步發展為新的大型經濟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66頁。

何德章對南朝吳會地區之經濟及人口狀況做出深入研究，最終得出結論：「南方真正可以算得上經濟區的只有會稽、吳郡、吳興所在的『三吳』地區。」〔註 13〕而著眼於建康與三吳地區聯繫，以及這種聯繫對南朝造成的影響，目前仍然以臺灣學者劉淑芬的論文集《六朝的城市與社會》為主〔註 14〕，指出了上游的軍事區域與下游的政治區域、經濟區域乃至文化區域之間相脫離對南朝政局的影響，其中《六朝建康的經濟基礎》一文亦明確指出吳、會地區是建康的經濟命脈。該書上篇〈建康城〉對六朝都城建康及其在六朝政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日本學者越智重明在《魏晉南朝の人と社會》一書中第四章第四節〈國家財政の窮乏と州鎮の自律性、民間の財力〉中對建康的財政困境有所描述，但主要側重於宋代。對於南朝而言，財政的緊張一直困擾著建康政權，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目前稍顯不足。

對於南朝之疆域格局研究，較為突出的為胡阿祥的《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註 15〕，從三國孫吳對江南疆界的拓展到南朝各代的疆界變化，都做出全面系統的統計分析，對六朝的軍鎮的攻守形勢做了一定的探討，同時對六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也置墨頗多。

對中古區域史研究的關注，直接促使對南朝由都督制的制度探討到對個別軍鎮的深入考察〔註 16〕。章義和的《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對地方勢力的崛起及軍鎮勢力的消長都有較深入的研究。另臺灣學者吳慧蓮的《東晉劉宋

〔註 13〕 何德章：《中國經濟通史》第三卷第二章〈自然生態環境與區域經濟狀況〉，85 頁。

〔註 14〕 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周一良在《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晉書〉札記·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亦從地理的布局對五朝政局造成的影響做了一定的探討。

〔註 15〕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學苑出版社，2005 年。另張承宗、田澤濱、何榮昌主編的《六朝史》也有對六朝疆域的關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註 16〕 對都督制進行統觀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多，最具代表性的為嚴耕望所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此後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第二章第二節〈都督區的形成及演變〉（中華書局，1993 年）、陳琳國在《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第六章〈魏晉南朝都督制〉（文津出版社，1994 年）、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第四至第六章等都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程度涉及。日本學界主要有小尾孟夫在都督制問題上進行了集中研究，氏著《六朝都督制研究》一書中，深入探討了南朝都督制的源起，並分類的對各種不同形式的都督做出針對性研究。日本溪水社，2001 年。

時期之北府》個案的對京口軍鎮及徐兗地區做了深入探討〔註 17〕。著眼於軍鎮的論文主要有：何德章的〈釋「荊州本畏襄陽人」〉〔註 18〕和臺灣學者傅樂成的〈荊州與六朝政局〉〔註 19〕，均從戰略上分析荊州、雍州軍鎮的地位，關注荊、雍二鎮的論文頗多，這裡不一一列舉。對以益州為中心的研究目前以李文才的《南北朝時期益梁政區研究》一書，對整個南朝時期對益梁地區的統治情況作出了一定考察。邊境地區豪族在南朝軍鎮武裝中影響頗大，也逐漸受到學界關注，韓樹峰在《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一書中，對南朝各個地區的邊境豪族做出系統梳理，為東晉南朝時期的豪族研究奠定基礎。對南朝軍鎮個案研究的成果仍有許多，這裡不一一列舉，但區域史的個案研究並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南朝地域性研究的發展，也不能在宏觀層面上找到南朝各軍鎮勢力消長的原因，並且從經濟層面關注軍鎮力量的著作亦不多。

對於南朝軍鎮的財政問題，成果較少，學界目前僅日本學者越智重明在 60 年代發表論文〈南朝州鎮の財政について〉〔註 20〕，對軍鎮的財政來源問題提出較多創見。由於政權財政對吳會地區的過分依賴，也促使軍鎮地區財稅收入留鎮的狀況，不僅如此，邊境諸臨敵軍鎮，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鎮或建康財政的直接補充，州鎮財政的自主在南朝軍鎮屢屢舉兵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越智重明亦未做深入探討。

三、史料與方法

目前幾乎所有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者均深感史料之不足，相對於北朝碑刻墓誌的大量出土，南朝在新材料方面劣勢明顯，這也是近年來南朝史推動緩慢的重要原因。目前對南朝歷史的研究仍近於完全依賴傳世文獻為主，南北

〔註 17〕對北府兵的研究，最為突出的是田餘慶先生的〈北府兵始末〉一文，收於論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2004 年。

〔註 18〕收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另外他在〈宋孝武帝上臺與南朝寒人之得勢〉一文對雍州勢力有相當的考察。載於《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3 期。日本學者安田二郎在〈晉宋革命與雍州（襄陽的僑民）〉一文中也有對也有對雍州地方勢力的探討。收於《日本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註 19〕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

〔註 20〕陶新華在《魏晉南朝中央對地方軍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一書中對此亦有涉及，巴蜀書社，2003 年。

朝時期史學興盛，《隋書》卷 33〈經籍志·史部〉所載 817 部史學著作至今所剩無幾，故對東晉南朝而言，主要可徵史料仍為《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及《南史》諸部。《魏書·島夷傳》是以北朝人角度對南朝史的記載，成為瞭解南朝史的重要材料，但因治史角度的不同，對南朝的記載頗有不實。收入《隋書》的《五代史志》也是部分涉及南朝的重要材料。

涉及到東晉南朝的地域性以及經濟特徵諸方面，主要集中在〈地理志〉抑或〈州郡志〉以及〈食貨志〉，而這段歷史正史僅《晉書》、《隋書》擁有〈地理志〉，《宋書》、《南齊書》有〈州郡志〉；〈食貨志〉則只有《晉書》與《隋書》具備。正史以外《通典》對這兩方面做了系統梳理，且因成書時間較早，成為正史以外最為重要的材料。與此同時，《初學記》、《藝文類聚》則相對較為分散。

南北朝時人酈道元著錄之《水經注》，以水道為系統對南北朝時期地理狀況做出全面了記載，對於今天研究南朝史仍助益頗多，然由於其受地域限制，對南朝部分的記載相對簡略。這已是南北朝時期現存較為完備的地理類著作，其經濟狀況也有很大程度的涉及。成書於唐代中後期的《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古時期又一重要的地理著作，而對東晉南朝的南北朝時期的地理及經濟問題並無下意識的梳理。

宋代四大類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相對於東晉南朝以《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價值最高，其分門別類的特點，為經濟與地域性的掌握提供了便利，同時亦增補了一些正史以外的材料，這些對於史料嚴重缺乏的東晉南朝史研究彌足珍貴。

唐人許嵩著《建康實錄》是以江南為中心的實錄體史書，然超出《三國志》、《晉書》及南朝五史之史料甚少，其對建康城市布局的記載較為重要。宋人司馬光所著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其中對南朝時期的記載雖較為系統，而於史料補充亦較少。宋元之際胡三省為之音注，亦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其價值。

對歷史文獻的搜集和運用是歷史研究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魏晉南北朝歷史在文獻上相對缺乏，這也是歷來史學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南朝歷史更是如此。王國維指出史學研究之二重證據法，利用傳世典籍結合出土文獻對歷史問題做深入探討。在傳世文獻方面，南朝史研究通常以有限的南朝

五史爲基礎，結合唐宋以來各史家著作，輔以唐宋時期之幾大類書；在出土文獻方面，相對於北朝，南朝極爲匱乏，所出之碑刻墓誌較少，但仍不失爲正史研究的補充。結合以上，基本上構成了南朝史研究所可依賴的文獻主體。史學研究，必以文獻爲宗，捨此途徑，即必然陷入浮光掠影似之空談境地。筆者擬以對比研究法作爲輔助方法，對同一時期各地區的對比和對不同時期相似事件的對比，地區與地區的對比、中央與地方的對比，從經濟、軍事到政治等各方面探討南朝史的發展。

總之，本課題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側重於經濟地域性的研究，通過對都城及其在輻射範圍——揚州與軍鎮區域的經濟運轉探討政局發展的主導性因素。從揚州境內固定的經濟運轉模式，探索南朝政權在定都建康以後，一直深陷的財政危機及其影響，實力雄厚的軍鎮一直處於相對孤懸的狀態，地區經濟及財政狀況的短暫性好轉，直接促使其領導人覬覦建康皇權。通過這樣的對比，或許可以從另一側面解開南朝時期政變不斷，藩鎮入主頻繁的根源。從經濟基礎探討上層建築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南朝經濟史與政治史研究相對脫離的狀態，通過微觀的考察從宏觀上探尋主導南朝政局演變的因素。

